

周远清 著

中国教育家文存

教育家文存

周远清 卷

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理应对全人类的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中国也确实不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了独特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改革成就和新时代的教育家。他们为教育改革殚精竭虑，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直接推动了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并将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继续产生深刻影响。为了记载历史、研究现实、把握未来，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国教育家文存》。能够真实记载中国教育改革以来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生动呈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为教育改革的新探索提供经验，为教育研究的新思考提供滋养，推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是我们出版这套书的目的。本书是周远清先生教育思想的真实记录，也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真实写照。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

老

人

西曆一九二九年

三月三日

周
远
清
著

中国当代

教育家文存

周
远
清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 周远清卷 / 袁振国主编; 周远清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5617-4516-8

I. 中... II. ①袁... ②周... III. 高等教育—中国
—文集 IV. G6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5171 号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 周远清卷

著 者 周远清
策 划 朱杰人
责任编辑 吴法源 李永梅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北京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19.75
插 页 6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7-5617-4516-8/G · 2626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代前言

周远清 教授
访谈录

袁振国教授(以下简称袁):周部长,您好!您在高校工作了很长时间,从事高校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到了教育部之后,分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现在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做会长,指导全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我想先请您就我国教育改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作一个回顾和评价。

周远清教授(以下简称周):这些年教育的改革发展,我想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体制改革。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时候曾经提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是关键。教育其实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我个人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新的体制的建立。过去高等教育长期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1952年以后,学习苏联,苏联已经变了,但我们还是没变,我们的高等教育,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我归纳了两个字,一个“包”一个“统”,一切都是由政府、国家包下来的,一切都是由政府和国家统起来的。高等教育要改革发展,必须从体制入手。

比如说缴费制度的改革,这是一个成功的改革。上次有记者找我,希望我谈谈高教收费的问题。我说:这是我国比较成功的一个体制改革,要没有这个改革的话,咱们想想,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发展。现在当然也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要通过完善体制改革来解决。总体上说我们过渡得比较好。缴费改革,有的国家就没办成。国外的很多教育家或者大学校长,都认为缴费改革是我们国家很成功的一个改革。长期以来,我们上大学不缴纳学费,完全由国家包下来。我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

是我到教育部工作的时候，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义务教育是可以收费的。没有缴费制度的顺利改革，中国高等教育不可能发展到现在。但收费以后如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则需要研究。我多次讲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不能让贫困的合格的学生因为经济的原因上不了大学。

第二个体制改革是管理体制的改革。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说有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中央部委院校的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部委不能再管学校，不能再管企业了。300多所学校都要进行调整，这是个很大的动作，有很大的阻力。今天回过头来看，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这个调整非常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连小字报都没有。第二件事情就是合并。肯定有一部分同志不太理解合并，但大多数人都逐渐取得了共识。那为什么要合并？两条。第一是我们过去的学校学科太窄，科类单一，文、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分科、分类办学。过去连一所综合大学都没有。这样就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科研上不去，大学科办不起来。你看现在北大，北大成立了18个跨学科中心，有医和药的跨学科中心占13个。清华为什么还要搞医学院呢？他们非常明确，未来十年知识的增长点，主要是在医和药跟其他学科的交叉结合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培养人的需要。我们过去科类单一，思维方式太单调。工科的学生、理科的学生与文科的学生，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学校文、理、工科都有，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中国原创性的成果出不来或者出来得少，高水平的东西受到限制，教育是重要原因——因为这两条，所以得合并。合并，当时的方针讲得非常清楚，有条件的学校要使它更加综合一点。整个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標是中央、地方两级管理，以地方统筹管理为主，这件事情的进展现在应该说还不是很明显。

接下来是办学体制改革。办了这么多民办大学，现在有15所本科了，近500所专科，还有1000多所自学考试机构。办民办就是大学体制改革。这几年，民办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再有就是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后来这么多学校合并，中层干部为什么很快就调整好了呢？就是因为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竞争上岗。刚开始合并的时候比较困难，比如最早的川大，当时我们还没有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竞争上岗这一条。

还有招生就业体制改革。经费筹措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的、办学体

制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招生就业体制改革，可称之为五大体制改革。当然，这个阶段也作了很多教学改革，比如说教学评估、调整专业。专业目录数原来是800，后来压缩到500，1998年又压缩到249，等于跳了两次。还有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体系改革、文化素质教育等等。

第二阶段呢？我认为是发展的阶段，为什么会出现大发展阶段呢？第一，一般来说一个大的改革以后，就会紧接着有一个大的发展，但到底发展多少，这需要我们主管部门来掌握和控制。第二，当时规模确实比较小，效益也比较低。1990年前后全国的高等学校有1000多所，全国的大学生总数才190万。1000人以下的学校有很多，我称之为“微型学校”。现在我们的注册生已经超过2000万。这是一个大发展阶段。

第三个阶段，从前几年开始，以提高质量为中心，是提高质量阶段。这个阶段首先要强化质量意识。现在应该说还不够，因为改革最后成功不成功决定于我们的教育质量。如果几年以后质量大滑坡的话，那肯定不能说这个改革是成功的。但现在对质量高低下判断为时尚早。一个短时期里笼统地去评价它的质量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这很难。这个不光是今天，1992年就碰到过。当时的情况也很复杂。学生厌学，教师、学校（精力）投入都很不足。当时我曾经总结过四个“投入不足”——经费投入不足，教师精力投入不足，干部精力投入不足，学生学习投入不足。三种情况——滑坡的，严重滑坡的，有滑坡趋势的。当时也有争论啊，有人说质量提高了，我们的外语啊、计算机啊大有提高。确实，外语、计算机大有提高，因为当时四、六级考试刚开始，计算机过去没有啊，那个时候变成各个学校的基础课了。说质量下降的也有好多理由，所以当时我提出来不要去争论。但要高度重视教学上出现的问题，逐个去解决，大概也就一年半到两年，基本上慢慢走上一个比较稳定的改革阶段。今天我还是强调这一点，不要去争论——争论不清的。

袁：这三个阶段的大致时段是——

周：第一个阶段大概可从1985年到1998年、1999年；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1999年到2000年、2001年；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2001年至今。

袁：当然这也是有交叉的，不是截然分开的。

周：对！比如现在这个提高质量的阶段，不是说它没有发展，它还是要发展，要改革。这个阶段第一条是要提高质量，最核心的是要提高教学质量。我曾经讲过，学校要视教学为生命、视学风为灵魂、视培养人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我觉得现在对教学工作的重视加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我觉得在高教中有两条：其一，规模、质量、结构、效益要协同发展。1992年，我们提出规模要有较大的发展，质量要上台阶，效益要明显提高，结构要更加合理。其二，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的高教战线有一系列的“重”、一系列的“轻”，这个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教学、重理轻文、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重智轻德。这里头有些“重”、有些“轻”，跟国外的一些发展得比较好的大学并不是一致的。第二条，我认为要完善体制改革，深化教学改革，强化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这点我认为现在做得可能不够，比如说那些合并的学校可能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比如缴费，为什么现在反应那么强烈？这需要认真研究一下缴费究竟怎么办，怎么个弄法。现在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学校的政府投入占整个学校的资金比例较低。

袁：一般不到50%，有些不到40%，还有些更低。

周：全国都不到50%，这都是问题啊，要研究。另外，整个高教的体制要以地方统筹管理为主，究竟怎么建立这个体制？当然有一些调整还在做。比方说上海交大跟上海二医大合并，这次解决了；还有兰州医科大学与兰州大学合并，这就是完善体制改革。还有，就是扩大开放。多年来我有个看法，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开放。我们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应该说都是吸收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成熟的经验的。比如说合并，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国外好点的大学都是比较综合的。学校的发展得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定——中国应该有一批这样的综合大学。

从1992年开始的体制改革有十多年了，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一条，没有出任何问题，也没有说哪需要翻过来，重新去折腾的，你说是不是？我们的合并没有出任何问题，包括北大的合并。当时北大是最敏感的地方，甚至有人跟我说，你们怎么说合并就合并，你把北大和北

医两个折腾起来，出了事怎么办啊？当然现在想起来也有点后怕。现在来看，它还是符合大学发展规律的。很多教授、中层的干部，都赞成合并，因为它是对整个学校水平的提高。无非是一些干部的安排有困难。干部涉及到很多方面，你不能要求他一下子就通啊。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是赞成提议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教育当然要加强，但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先提高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问题我曾经归纳为三个：第一专业过窄，第二外语水平偏低，第三人文教育过弱。我不知道对不对。

袁：这都是培养人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周：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改革是先导。1992年左右我曾经在一次会上讲：“一场教育思想的大讨论，在中国悄然兴起”，用了两个字——“悄然”，因为不是教育部提出来的，而是自发地讨论起来的。当时清华大学组织讨论，学生也参加。讨论中，学生曾经提过一个问题，我们是各个学校来的优秀学生，甚至是尖子学生，到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把我们都培养成一个样了，没个性了。这是我们又一大缺陷。思想观念的改变很难。

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体制改革还要难。

周：还要难！所以后来提出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是先导。1994年，我在一次会上曾提过“三注”：注视创新能力培养、注重素质教育、注意学生的个性发展。当时还不太敢说这个，加了一句“全面实行因材施教”。这个“全面实施因材施教”就为躲这个“个性”。我记得后来吴树青同志下来以后两次和我讲，他说他也很赞成这个提法。

袁：您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

周：一个是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的讨论，这就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个性，个性也包含了学校的特色。我曾经提出培养的学生要有个性，办的大学也要有特色，中国要有自己的路子。这个可能跟有些人提倡的不完全相同。我不大同意“与国际教育接轨”。我曾经说过：“教

育在国际上没有共轨。”所以回过头来说，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袁：我们这几年连续开了几次大学校长论坛，这也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大学校长在论坛上也谈了很多想法。您对我们自己国家的情况很熟悉，在国际上也看了很多的学校，您认为我们的大学，与国际上的大学相比较，优势和弱势在哪里？

周：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好回答。我老说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美国、欧洲、东方，都不太一样，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比如东方，日本呀，新加坡呀，也包括中国，不太一样，很难去用一种共同的东西去衡量中国跟外国怎么样。但是有一条，我不太同意“与国际接轨”这个提法，但是我还没写过文章。因为这里头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我长期琢磨过，经济的国际接轨，其实也不要过多地去宣传，我觉得咱们不是特别清楚。国际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都是发达国家剥削不发达的国家。我们现在参加WTO后也需要用我们的办法、用我们的影响去争取改变一些国际游戏规则。在教育上“与国际接轨”，就更不行。教育战线因为有经济基础的属性，也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另外还有传统，所以可能比较好的提法是：虚心学习别国的成熟的经验，走出自己的路子来。

袁：确实是这样，发达国家制定规则时，它是从它的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等到发展中国家对其形成威胁的时候，他们又要改变规则，比如在中美贸易磨擦问题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周：所以我们不要被动地去接轨，这个可能是今后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我的想法是：虚心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走出自己的路子来。但是这个我确实没去写文章，讲话我倒讲过，因为我总觉得还需要很好地去琢磨琢磨这里头的内容。

袁：您刚才说到个性发展的问题，其实我们讲创造性、讲创业能力、讲就业能力，都跟个性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现在在教育模式上，在发展个性上，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呢？

周：这里头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这几年琢磨，就是我们现在的教师也好、学校干部也好，都是过去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他非常习惯于那个模式，所以要他改起来、思想变起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我说仅用工科脑袋办不成一流的大学。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虽然我们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学校都在变化中——但他的思维还是过去单科类学校培养出来的思维，要么文科出来，要么工科出来，并且他是在一个学校都是一个科类的氛围中培养出来的，要改变很难。但是如果这个不改变的话，确实，中国教育要取得很大成果也很难。我个人总是认为，教育的事急也急不得，慢也慢不得。

袁：小步快跑。

周：所以我们才说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是最重要的。其实，有些事情只要说到点子上，大家都会取得共识。

袁：但是要不是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光停留于口号是没有用的。

周：道理就是这样。我们是在过去的体制、过去的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办学理念，受那个时候很强大的影响。为什么提出文化素质？它是个突破口，是个切入点。这个地方正是我们薄弱的地方，它容易引起思想共鸣，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

袁：您强调的文化素质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周：过去我在开始试点的时候有一个定义——稍微说远点，我觉得高等教育有三要素：素质、能力、知识。我们过去有个习惯说法，说“这个人能力很强，但素质不高”，或者说“这个人素质特别好，但业务能力不够”。这里就区分了素质与能力，说明大家都希望这个人素质要好、能力要强，所以能力跟素质是两个概念。基础教育我说不大清楚，我认为高等教育有三要素：素质、能力、知识。素质是个什么东西呢？我这样定义，这也是吸收了大家的看法，不是我个人说的。知识、能力经过实践内化为人的稳定性品格，就是素质。素质是一种品格，稳定性的品格。素质包含

了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这里头我们加了一个文化素质。那文化素质是什么呢？当时有个说法，文史哲的基本知识、艺术的基本修养、当今中国和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三条。我认为这三条就是构成文化素质的主要方面。

袁：您现在在领导高等教育学会的工作，您对高教教育科学研究有什么意见？

周：教育科研的文章我还写了点，这两年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所以老唠叨这个。我说我们是一个弱势群体。你看我们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点，前几年才4个二级学科，这两年增加了3个。我们这两年搞了一个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不知你知道不？

袁：我知道，是你们学会搞的。

周：才100多篇，不是评了100多篇，是发表过的文章总共加起来才100多篇。所以评选只能在100多篇里评。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还有两个高教研究博士点，那交大、南大、浙大、科大和复旦等这些大学怎么连一个博士点都没有呢？我说你们研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这我是多次讲过的。不研究自己就是不研究教育，所以教育研究确实非常薄弱，这个必须改一改。有一个数据，美国在1985年的时候就有7000个高等教育学方面的博士。而且我们现在毕业的博士出去以后，很多人也不从事教育类科学研究，他去做教务处处长、科长啦。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后来我们搞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我估计会起一定的作用。你知道吗？办公厅发了一个“加强教育科学研究机构”的文件。

袁：有一点印象。

周：大学里头的教育研究机构，精简的时候都精简掉了，或者去写文章、写报告去了。

袁：有的成了秘书处。

周：这个和我们的研究有点关系。我发现很多博士论文，把国外的经济学原理套在我们国家的教育上来，名词一大堆，自己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不去研究。当然研究问题也很难，因为你研究你的，你发表了文章也就完了，别人也不重视你。你如果确实找到了规律，我觉得它产生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很多事情做起来可能很难，但是一旦做成了以后，它起的效果就很大。

袁：您这几年也特别关注民办教育的问题，关注民办教育的发展。关于民办教育的问题议论也比较多，各式各样的意见都有，您怎么看？

周：民办教育从一开始我就非常赞成，我曾经也了解过日本的民办教育。我曾经提出来过，扩招主要在民办高等教育，要民办高等学校去扩招。当时一些部门讨论不大同意，当然这是个很复杂的事。一些民办学校的校长谈过，他们说民办能不能发展，看我们整个国家的观念。你看欧洲没有民办，没有私立大学。它有私立大学也是点缀性的，对吧？但是中国呢，这么多人口，不光是国家大，差距也很大，不平衡。所以我是非常赞同民办高等教育的。第二，我认为民办高等教育有它成功的经验。我个人认为民办高等教育跟世界上的私立大学意思差不多，对它政策可以宽松一点，比如说它收费可以多一点。其次，他们充分利用国有大学退下来的教职工。这些人啊，有不少经验，加上我们政策上的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可以发展得很快。当然它也有很多具体问题，什么产权不明晰啦等等。其实关键还是要有很好的理解，要重视。我看有些地方，特别是地方政府卡得过紧。当然现在办的情况也不一样。

袁：参差不齐。

周：可能有些政策呢，要做些调整，对民办高等教育要像普通高等教育一样进行大力研究，包括它的教学，也要大力支持。

袁：现有民办教育可以享受的政策还是有些限制，很多项目对民办高校是不开放的。

周：民办教育在中国还是很重要的一条路子，问题是怎么走好。我老说这句话，我们中国的民办教育是夹缝里头长出来的，但是它有成功的路子。我们应当走出民办高等教育真正的路子来。

袁：今天的采访对我们也很有教育意义。谢谢您！



周远清先生近影

丛书 序言

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理应对全人类的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中国也确实不断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自己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不断涌现出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改革成就和新时代的教育家。我国一大批教育专家学者上下求索、大胆实践，为教育发展出谋划策，为教育改革殚精竭虑。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直接推动了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并将对今后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继续产生深刻影响。为了记载历史、研究现实、把握未来，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希望《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能够真实记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生动呈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为教育改革的新探索提供经验，为教育研究的新思考提供滋养，推动教育的不断深化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

编者

2005年10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代前言：周远清教授访谈录	1
第一篇 教学改革	1
1. 改革，建设，管理	3
2. 确保教学改革的核心地位	9
3. 教学在升温，教学要再加温	15
4. 有计划高起点地推进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23
5. 在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推进“两课”建设	30
6. 真正把教学改革放在核心位置上	38
7. 跨世纪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46
8. 质量意识要升温，教学改革要突破	78
9. 教学工作优秀评估是教学改革的重头戏	96
第二篇 教育体制改革	105
1. 关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问题	107
2. 加速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势在必行	118
3. 改革高教管理体制 开创高等教育新世纪	129
4. 高等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与创新	143
5. 实现高考改革的新突破	158
6. 坚持“发展、改革、提高”的思路，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不断适应社会需要	164
7. 重视专业学位教育，搞好 MPA 教育试点工作	175
8. 完善体制改革，深化教学改革，强化教育思想改革	182